

这真是一个酸楚的开端。一种崭新的、柔软的情感从爸爸住院起开始滋生了。如果能选择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，我深信，自己是怕爱甚于怕恨。
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羡慕那些行走在阳光下，身体舒展、表情惬意的人们，羡慕属于他们的没心没肺的小快乐，因为我和爸爸的命运在这个夏季被拦腰截断，它蜿蜒所至的地方了无生机。

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受到贫穷的滋味：贫穷，不是没有漂亮衣穿；贫穷，不是没有肉吃；贫穷，不是没有房子住。而是，爸爸要走了，我却没有能力留住他……

ISBN 978-7-5007-9780-7



定价：19.00元

假设绝望得让我心酸，绝望得让我窒息，绝望得让我此时此刻，生不如死。

妈妈来医院后，我曾和医生交代过，爸爸病情的进展只能告诉我一个人。我不想让体弱多病的母亲最先听到不好的消息。有天上午，我下楼买东西，留下妈妈照顾爸爸，等我回来后，妈妈说她有点儿感冒，叫我陪她到一楼急诊室打吊瓶。我和爸爸交了两句就和妈妈一起走了出去。

刚走出门，妈妈就紧紧抓着我的手臂，眼圈猛然红了。我奇怪地问她，怎么了？她看了看来来往往的人，摇摇头，只说，快走。我被她拖着走到一个无人的拐角，妈妈一下子就扑进我的怀里大哭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我搂着她瘦弱战栗的身体，紧张不安地问道。妈妈说：“医生刚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，你爸爸可能是淋巴瘤。”

我大脑“嗡”地一响。其实，我早就有类似的预感，但因为一直没有作成病检，所以心存侥幸。现在，好像一切被证实了，爸爸得的是癌症，而且在我下楼的间隙，妈妈成了第一个知道的人。我一边轻轻拍着妈妈的肩膀，一边对她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医生只说是怀疑，没有切片，谁都不能下诊断，也许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，再说，就是癌症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也可以治好的。

我对着洁白的墙壁，期望能说出坚定的、不容置疑的话，可那些安慰的言语在空旷的白色里回荡，妈妈并没有停止哭泣，相反，她开

始在抽泣中斷斷續續地說起來：“我覺得都是我把你爸爸害成這樣的，他來住院的前一天，我還在家里和他吵架，我還罵他，你怎么不早点兒死！都是因為我說了這句話啊，現在他變成這樣，我好後悔啊！我再也不會和他吵架了，只要他能好起來……”

我的心猶如刀割，爸爸和媽媽之間的爭吵一直都很頻繁，並且幾乎每次都是爸爸無理取鬧，譬如媽媽經常接濟貧困的大舅，爸爸就會罵她，說她不應該老給舅舅錢。因為這些，我非常恨他，恨他沒有怜悯之心，恨他冷酷無情，恨他口不擇言傷害他的妻子并拳腳相加，而媽媽又是那麼善良、寬容的人，我一直覺得媽媽和他在一起，受盡了委屈。所以，我不止一次對媽媽說，為什麼不和爸爸離婚。媽媽對我說，是想過，但還是不忍心，他從小親媽就死了，心里有陰影，個性也不好，他身邊的朋友都被他得罪完了，那麼孤單，我們再離開他，他可怎么活啊？是的，媽媽和我一樣，我們時常因爸爸的冷酷而恨他，但內心里又可怜他，只是和媽媽相比，我對他少了寬容，因為我還有漫長的人生將度過，我不想一輩子被爸爸左右。

媽媽坐在椅子上打着吊瓶，我一直在旁邊安慰她。我告訴她，沒到確診的那天，我們都不要放棄希望。誤診，不是經常會出現的嗎？切片，不是到現在都沒做嗎？我摟着媽媽的肩膀，給她擦眼淚。“可是，你看他現在的情況。”媽媽淚水不斷涌出。我看着她因常年貧血而蒼白的臉，使勁握住她冰冷的手，安慰她：“不管怎樣，爸爸現

2007年的8月，和以往的盛夏一样，空气焦灼，被热浪卷起的尘土在眼前飞舞，时常让人恍惚。我站在客厅的镜子前，端着一杯冰水，爸爸走到我身边对我说：我去找医生问过，他们说那只是淋巴发炎。我放下杯子告诉他，无论如何，在我出门之前，你要去医院作一次体检，这样我才能安心地出去。爸爸默默地走开了。半年前我就隐隐地听他说耳朵后面长了一个黄豆大的包块，很多次当他提起的时候，我都心不在焉地建议他去医院看看，他一贯身体康健，很少去医院，所以对这个小包块，我们一直忽略。有时候他会让我看，在我问他疼不疼被否认后，我告诉他，应该是淋巴发炎，他说药店的医生也是这样说的，并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，只是服用后，小包块还在。每当他和我说起这个不疼不痒的问题时，我都会说，再等等吧，也许过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。爸爸相信了一个学医的女儿的诊断，他没有反对过，也没有提出让我陪他去医院彻底检查。而那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有很多远比这个小小包块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解决，我已经被无法写作的问题困扰了两年之久，我不知道这种能力是怎么消失的，又是为什么消失，它无缘无故、不由分说地弃我而去，在恐慌中，我每天都在寻找一条试图重新回归的路径。

一直到了8月13日的下午，我端着一杯冰水，站在客厅的镜子前对父母说，我要辞去报社编辑的工作，重新开始写作。当时，我认为可能是一周排十二个版面的工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所以决意在一年合同到期时离开报社，到外地去写作。犹如困兽，结局不被预知，但只要还有一线可能，只要我还惦念着充分的自由，就会奋不顾身地争取。所以，我说：走之前，我要带你们去医院作一次全面体检。突如其来的提议，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再次叛离的愧疚。我知道，爸爸妈妈是不愿意我离开报社的，尤其是在经历了两年没有保障、颠沛的写作生活后，这份薪水优厚的稳定工作，他们希望我能永远干下去。

我已经叛离过一次，2004年的冬天背着父母辞职，离开了工作六年的精神病院。这次重蹈覆辙，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——我是无法安定的，所以爸爸妈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安排。

第二天，等我从寝室赶到医院，爸爸早已作完了抽血检查。我陪着他吃完早饭后去拿化验结果。在医生办公室门口，爸爸冲我摆了摆手，叫我在外面等他，过了很久他才出来。我走上前去问他医生怎么说，他神色有些慌乱地告诉我，医生让他住院观察。我很诧异地问他，医生没说是是什么病吗？他摇摇

食堂买饭，相互宽慰对方住院只是一桩小事。走在回寝室的路上，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几次，浑然不知一场灾难将席卷一切。

第二天，我一去医院就发现爸爸肚子上插了一个微管，另一端连接在床头的白色盒子里。医生告诉我，这是胰岛素泵，要持续注射，并且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血糖。他有Ⅱ型糖尿病，在昨天的常规检查里，他的血糖高达30，你们以前知道吗？

一个人的餐前血糖正常值是3.9到6.1，连续三次超过7.0且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.1mmol/L，可确诊为糖尿病。我和主管医生都知道糖尿病的特征，爸爸餐前血糖竟然高达30？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只有爸爸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他一直问我，怎么会有糖尿病呢？他从来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。是的，糖尿病典型的症状是多尿、多饮、多食与体重减轻，这在他身上并不明显，但随后几次的血糖监测都在30左右徘徊，连我也不得不相信，爸爸确实患有糖尿病，而且血糖高出正常值很多。医生告诉我，糖尿病会引起冠心病、心绞痛、心肌梗死、肾衰、失明等多种并发症，最后导致的死亡率高达43%。我不敢转述给爸爸，更不愿意承认他应该是数年前就患上了糖尿病，而我们却浑然不知。医生说，只有把血糖控制在安全范围

内，才能进行耳后包块的切片，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创口很容易被感染，而后直接导致死亡。

现在，那个包块好像已经无足轻重了，如何控制血糖成了重大的问题。因为要用胰岛素泵，不能下床走动，我就一直守在床边照顾。爸爸看起来很乐观，生病让一个人被迫缓慢，在药水百无聊赖的流动中，他描述起一个从不被我所知的少年。

他保留着生母的一张黑白照片，那个年代的人面容平静得近似冷酷，短发、眉目清淡。在我看来，她的神情里总有一股阴冷之气，或许只因为她不是流动的，凝固在粗糙的纸片中。那时候，她也不过二十来岁吧，却不富有青春气息，严肃的表情和僵硬的脖子，有男性的生硬。我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，我不知道父亲握着她的照片心里作何感想，面对着在他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死去的母亲，他是陌生还是熟稔。生母去世一年后，后母过门，再后来，他多了四个弟弟。他的童年在一片嘈杂声中度过，我没有问过，和同父异母四个弟弟一同成长，他内心是否充满疏离感，从他的述说中，仿佛还是亲密的。唯有一次，他告诉我，因为一件小孩子常做的坏事，他被后母责打，因为爷爷是老革命，长年在外办公，没有庇护者。黄昏时分，他还躲在柴房里。他想偷一块明矾，当时人们用它来净化

爸爸低下头轻声说道：“当时都十二点了，你们那里都锁大门了，我想你也睡了，叫醒你，你还要下去请人开门，太麻烦了。所以，我就先给珍珍打了电话，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”

听完这话，我使劲仰着头假装在看墙上的“住院须知”，我在抑制着快要流出的眼泪，他好像不是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父亲，他为何变得这么善解人意？他仿佛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刚愎自用、冷酷暴躁的人，更像是个满怀委屈的孩子，虽然，他自己不觉得受了什么委屈。

其实，我通常都是清晨才睡觉，大家都以为我在通宵写作，事实是，我在一宿无眠中疯狂地玩网络游戏。只有一年，我刚辞职的那一年在写作，其余的几年，都用于虚掷。后来，我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甜点，爸爸问我花了多少钱，我把价格都降低了几分之一告诉爸爸，他依然说，太浪费了，你也没什么钱。

这真是一个酸楚的开端，我看着爸爸放在被子上开始生长老年斑的双手想到，一种崭新的、柔软的情感从他住院开始滋生了，如果我能选择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种情感的蔓延，我更愿意继续以往的淡然、隔离，甚至对立的父女关系。我深信，自己是怕爱甚于怕恨，最终会死于心碎的人。

一周过去了，爸爸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，不是血糖过高就是矫枉过正变成低血糖，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。我一遍遍地跑去找医生询问，医生的脸色越来越差，语气也很不好。爸爸每天带着胰岛素泵躺在床上，失去了自由，对习惯走动的他很是煎熬。对此情况，我完全无能为力，只能坐在病床前不停地找话题和他聊天。回到寝室的时候，我一边在网上查询糖尿病的相关知识，一边做笔记，我不知道这场治疗什么时候能结束，爸爸什么时候能离开医院恢复以往的生活。

有天晚上从医院回来，我在洗漱间洗衣服，遇见一个住在同楼的朋友，他问我这段时间在做什么，老是看不到我，我就把爸爸生病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。

“糖尿病？我母亲也是糖尿病患者。”

我猛然抬起头盯着他，“那么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
“她？”朋友淡淡地说，“她很早就去世了，先是失明，然后多器官衰竭。”

“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吗？”

他说：“要是发现得早，还可以控制，但是，我妈妈患病很久才知道的。”

这句话马上让我联想到了爸爸，我默默低下头，机械地揉搓着手里的衣服。

他端起盆子将要离开的时候，和我说了一句话，“你知道吗？最后，我们还是放弃了治疗，让她走的。”

我凝视着他的脸，很平静，没有哀伤，或许是他的母亲已经离开太久，或许只因为他是个男人，总之，他波澜不惊地说完这些话后就出去了。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，安慰？警示？如果我是在假设，如果爸爸最后也是这样离我而去，当我若干年后面对别人提起他的时候，会不会像我的朋友一样，带着云淡风轻的表情。

烈日炎炎，尘土铺天盖地而来，人脸上被打下灰色的手印子。我在医院和寝室之间往返，阳光从远方过来的时候，被繁多的建筑物截去了一大半；另一半跌下来，压在人们头上，压出干瘪的金黄影子，很小，很小。

一周过去了，爸爸的血糖依旧没有被控制在安全范围内，所以耳后的包块迟迟没切。有天他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，无意中我发现他的肚子很鼓，我对他说好像有些不对劲，他随意地摆了摆手说，没事，可能是刚吃完饭。

自从查出糖尿病后，他的饮食作了调整，必须少吃多餐，还有很多他以前喜欢吃的食物，都按医嘱戒掉了，他非常不适应，老和我念叨着想回家。我耐心地劝慰他，其实，自己心里早就烦躁不安。我不断地去找医生，为这么长时间的无效治疗而愤怒，最后医生决定让我们先转到糖尿病科，等降糖治疗后，再回来切包块。

转科那天，男朋友过来帮我和爸爸一起收拾东西。爸爸端着脸盆走在前面，我和男朋友在后面窃窃私语。我问男朋友，觉不觉得爸爸脸色特别差？男朋友说，生病的人当然气色不好了，别胡思乱想，都住在医院了，还怕什么啊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慌乱。

刚住进糖尿病科没几天，爸爸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他的腹部开始隆起，我的预感被证实了。他脸色蜡黄，全身无力，走起路来气喘吁吁，让人不敢相信一周前他是徒步二十多站来到医院的。一直不能进行包块切片，没有病检显示，这场疾病暂时无法定义，医生只告诉我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于是，我打电话告诉了妈妈，她辞职和我一起在医院照顾爸爸。一间病房住三个病人，没有多余的床，走廊上住的一个病人每天晚上回家，经过我的请求，她同意夜间妈妈暂睡她的病床，我则拿了把椅子彻夜坐在爸爸的病床边。爸爸起初反对，叫我回寝室去睡，我坚决不同意。

我从早到晚都待在爸爸身边，给他打洗脸水、买饭，一同在走廊上转悠，关系陡然亲密起来。我不知道他是否适应。

我从小就和妈妈最亲近。三岁前爸爸在部队，几个月才回来一次，每次他回家，我都会把他视为陌生人往外推。有一次在妈妈的诱导之下我叫了他一声“爸爸”，他高兴得把我架在脖子上，为了我第一次肯叫他，跑到小商店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。如果持续下去，我们会更加其乐融融，但不久后的一天，妈妈的同事拿糖逗我，让我叫他“爸爸”，我傻乎乎地叫了，站在一边的父亲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。妈妈说，那一天我

像是聋了，对所有的声音充耳不闻，她和爸爸大吵了一架把我送到医院，还好耳膜没被打穿孔。从小到大，他对我实行的是军事化教育，每天不能赖床，从闹钟响到穿好衣服，有五分钟的时间；吃饭不许说话，不许端着碗底，不许撒饭、剩饭；挤牙膏必须从底部挤起，牙刷要头朝上放；坐着的时候不能东倒西歪，必须双腿并拢；放学要准时回家，每天只能领一角早餐费……如果违反某项条例，就自己到门口，找个干净的地方跪着。上中专后，我必须住校，一周才能回家一次。周末，当我坐了二十多站的车，走到家门口时，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。我敲门，爸爸一个人在家，他没有立即开门，而是在门内问我是不是忘记带钥匙了。我说，是的。爸爸就开始隔着一扇门教育我。我等了几十分钟，他还是没有给我开门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牢记丢三落四的教训，我却气愤地放弃等待，转身又坐车回了学校。

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在童年时期，我曾不止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但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这个假设不攻自破，因为我的面貌和他如此相像。在我开始写作以后，我才敢主动询问他以往的经历。爸爸生于1953年，不足月生母就病逝，他一直被放在奶妈家寄养。半年后爷爷娶了他的同事，

瑰丽。

这个家里，新的婴儿不断出生，在一片啼哭和杂乱中，爸爸慢慢长大，他开始体会到孤独，年少的困惑和迷惘，无人回应。与后母自然是心怀戒备的，而爷爷又长年住在单位，其间所经历的很多事情，他在我的询问之下闭口不提，倒是母亲曾和我说起过，因为和后母之间的矛盾，父亲多次离家出走，不过在暮色降临时，他又主动回到家里，毕竟，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对陌生的世界心存恐惧。最危险的一次，爸爸偷了家里药老鼠的砒霜，在小河边坐了一个下午。我不知道他独自面对波光粼粼的河水想到了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冷酷已经在这个十三岁少年寂寞的身影中滋长。

所以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，这并不是站在一个被管束的女儿对抗父亲的角度来评价他的。在家时，他每天都要出去晨练，有天回来，一只小狗一直跟他到家门口，在外面小声叫着，我和妈妈刚跑进厨房准备给小狗拿点儿吃的，就听见它凄厉的尖叫声，等我们跑出来后，只见爸爸手持木棍，小狗瘸着一条腿拼命跑开了。每当我回想那条狗蜷着瘦小的身体，拖着被爸爸打折的一条腿，像小孩子哭泣般“呜呜”叫着，往楼下打着滚逃命的时候，我就会流泪。爸爸是无法理解

我这些细密的悲伤的，我毫不怀疑他是爱我的，但他在除了我之外表现出的冷酷、粗暴，已经不可挽回地深深伤害了我。因为这样冷峻的爸爸，我曾经对妈妈说过，如果我只有买一份礼物的钱，我会先给爸爸买，就是为了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，心疼他、可怜他。

在我慢慢长大、越来越了解他后，我就想，爸爸要的应该是个儿子。他所鄙夷的多愁善感却成了我个性里最重要的组成。他一直在冲压车间上班，属于危险工种，当年和他一起分配来的同事，要不就是出工伤成了残疾人，要不就想办法调出了冲压车间，只有他几近老年还站在巨大的冲床前，小心翼翼地把沉重的铁皮一次次放在冲头下面。初二暑假，正值我成绩下滑的时候，他专门带我到车间里去转了一圈，面对蓬头垢面的工人和轰隆作响的机器，他对我说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不然就是这个下场。没几天妈妈因为身体不适，我去了她所在的车间帮她顶班。下班回去后，爸爸问我亲身体会的感受，我说，不需要动脑，只消耗体力，还不错。我知道他很生气，所以故意这样说。没过多久，爸爸就出了工伤，他的大拇指被冲床冲断了，我赶到急诊科时，面对他的残指和身上的斑斑血迹号啕大哭，这使他觉得很尴尬。护士帮他包扎时，他有些恼怒地对

上厕所吧。我说完，爸爸就笑，他是觉得我怎么突然在他面前变得这么调皮了吧？在这个时候，妈妈就会马上跑出去，我知道，她是要找一个角落流泪。但是，我不能也起身离去，继续哭泣，我从来都不是自我约束力很强的人，而在那段时间，我必须暗自掐住虎口处，超常地控制住情绪。

一出病房，我就往医生办公室奔去，泣不成声地请求医生想办法，医生无奈地告诉我无计可施。我冲他吼：“医学不是变得这么发达了吗？难道这问题都不能解决吗？”其实，我心里知道，那不是一点问题，而是很大很大，是医学不能攻克的问题，但是我需要质问，需要吼叫。主管医生看着我的样子，他们不止一次看见我和妈妈躲在洗漱间哭泣，然后仔细地冲净泪水后再次走进爸爸的病室，他沉重地叹了口气，给爸爸开了缓解腹胀的药。

我们都知道这些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，我们只想表明对于这个还没被确诊的疾病，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的。医生决定给爸爸抽腹水，就算一个小小的针眼也会导致感染死亡，在医生办公室，他们对我说了一堆可能会引发的后果，而我的耳边不断回响着爸爸说：胀！最后，我哆哆嗦嗦地在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你不要带走他。其实，我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人，如果祈祷真的可以应验，我希望现在皈依还不晚，因为，我没有了别的选择。

我熟悉这样的夜晚，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独属于医院的夜晚。在我还是一名医务人员时，每次晚上值班就要隔五分钟巡视一次病房，以免精神病患者自杀。昼夜颠倒的工作让我苦不堪言，尤其是有病人夜间发病的时候，更是成为我莫大的负担，所以我仇恨他们打破宁静的夜晚，使我不能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偷偷打瞌睡。现在，我还待在医院，不过，作为患者的亲属出现，我才觉得那些病人是多么身不由己，多么可怜。我后悔当年对待他们的粗暴，一如我痛恨医生面对我爸爸病情时的漠然。

爸爸的脸在微弱的灯光下扭曲着，他在梦里轻轻呻吟，我知道，这是他不愿在我和妈妈面前表现出的痛苦。这样的夜晚并不好受，长时间坐在椅子上，让我头重脚轻，身体僵硬。可是，我更不愿意回寝室，虽然有柔软的床垫可以包容我精疲力竭的身体，我会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可是万一爸爸在一个甜蜜的睡梦中离我而去，以后的夜晚，我还能原谅自己、安然入睡吗？我不能，所以我一定要彻夜守候在他身边，至少，这样，